

瑶乡蝶变 折射山地贫困少数民族新生活

新华社长沙9月19日电(记者柳玉敏、袁汝婷、白田田)湖南省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的朱小红,现在是名副其实的“网红”。沙洲瑶族村是“半条被子”故事的发生地,朱小红作为故事主人公徐解秀的后人,备受外界关注。

身为瑶胞的朱小红,以前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。这几年通过开办农家乐、在景区务工,不仅全家脱贫,日子也越过越红火。

面对记者,朱小红难掩内心的喜悦,他说:“以前红军给了我奶奶半条被子,如今党和政府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日子。”

沙洲村地处湘南边陲,属于罗霄山中连片特困地区,瑶族人口占比64%,全村有142户529人,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0户95人,基础设施落后,产业薄弱,曾经制约乡村发展。

“受历史地理等因素影响,我国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状况。在湖南的瑶胞有80多万人,主要分布在永州、郴州、怀化等湘南地区的大山里,早年贫困人口较多。”中国瑶族文化传承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明生说。

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路上,夺取全面胜利,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。这是如今沙洲村看得见的变化——建成了红色旅游核心区,道路平整宽阔,老百姓住上了“小洋房”,沙洲村也被评为2017年度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。

“依靠精准扶贫等政策,以前是‘看到屋、走到哭’,如今公路村村通,困守在大山里的瑶民能够顺利下山了,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。”王明生说。

41岁的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瑶胞赵春花,居住在海拔近千米的东冲河村上,2018年8月,她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住上了新房,还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

“以前在大山里种玉米和红薯,收入来源少,如今在楼下的马达厂上班,每月收入3000元,比过去好多了。”赵春花说。

江华县位于南岭北麓、湖南省最南端,是湖南省唯一的瑶族自治县,也是集“老、少、边、穷、库”于一体的贫困县,全县人口54万,其中瑶族人口37.5万,被誉为“神州瑶都”。

近年来,江华县向绝对贫困全力攻坚,改善乡村基础设施,创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,引进小微企业实现贫困户稳定就业,增强当地老百姓获得感和幸福感,2019年4月,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江华县脱贫摘帽,越来越多的瑶胞从此走向小康生活。

在湖南省溆浦县葛竹坪镇山背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,入夜时分,时常能听到村民们歌唱具有地方特色的“呜哇”山歌。作为当地“花瑶”重要的民俗活动,瑶胞们在歌声中表达对幸福生活的赞美。

依托独特的梯田资源,山背村引进了一家旅游公司,打造梯田景区,建立了香皂花加工扶贫车间,发展猕猴桃等产业,村民们吃上了“旅游饭”。“搬下山后,我在家门口的旅游公司上班,现在的生活条件是以前不敢想的。”花瑶同胞刘美花说。

在湖南省蓝山县,52岁的过山瑶瑶胞赵友竹一家从80公里外的荆竹瑶族乡凌江河村搬进县城安置点,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安置房,还租下了一间便利店经营。“便利店生意日益稳定,我这个山民成了个体户,全家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。”赵友竹说。

一曲曲“呜哇”山歌,一幕幕长鼓舞表演,在湘南山间飘荡。

一张“作战图”指引脱贫路

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督战未摘帽贫困县

新华社贵阳9月19日电(记者向定杰)“2014年以来危房改造129户,2016年以来易地扶贫搬迁56户……”在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思渠镇边疆村村委的一间办公室,一张贴在墙上的脱贫攻坚“作战图”与扶贫干部朝夕相伴。

这张“作战图”除介绍基本的村情村貌、贫困户、致贫原因、脱贫措施外,还用表格把每一位干部与贫困户的结对关系一一标明。

沿河县是贵州9个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之一,位于武陵山区深处,自然环境恶劣,边疆村,地如其名,距离思渠镇20多公里,距县城近80公里。

在边疆村驻村扶贫的19名干部看来,“挂图作战”就是无声的命令,时刻提醒着他们保持“临战”状态。处在山沟里的边疆村,6个村民组居住分散,一条坡陡弯急的公路从半山腰盘旋而下,过去去公路时,出村的路是一条挂在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,赶集来回需要走4个多小时,群众出行、孩子上学很不方便。

打通山路曾是当地群众最期盼的事。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,边疆村的交通基础设施发生了巨大变化,通村路、通组路、串户路逐步完善。

路通了,如何发展产业增收致富?怎样提高群众生活水平?这是边疆村这类边远山村面临的共同难题。

边疆村党支部书记邓文远说,过去村里主要种植水稻和玉米等传统农作物,随着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,不少田地荒芜。虽然村里近年发展一些经济作物,但受交通、市场、人才等因素影响,产业尚未发挥有效带动作用。

“受客观自然条件的制约,边疆村一直以来存在基础设施滞后、产业基础薄弱、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,2014年贫困发生率高达40.83%。”思渠镇党委组织委员、边疆村脱贫攻坚指挥长晏飞介绍。

他说,作为市县两级出名的贫困村,尽管去年边疆村已出列,但去年底还有13户48人未脱贫,已脱贫的群众也面临一些返贫风险。所以,今年村里充实了脱贫攻坚指挥部力量。

今年2月,作为市级脱贫攻坚督导组,来自铜仁市委办公室的钱鑫来到了边疆村。不善言辞的他,说起自己的帮扶对象陈茂六,一下打开了话匣子。“他家住得有些偏远,仅入户路就硬化了500多米!”钱鑫一边说,一边在手机里翻照片。

“村里房子烂,很多都是木板板,产业为零,财政扶贫资金拿到别的村入股,虽然有分红,但哪有自己干好?”这是晏飞今年到边疆村后的最初感受。

对此,今年边疆村争取资金,一口气发展了雷竹、辣椒、茄子、冷水鱼、生态养鸡、金丝皇菊、精品水稻7个产业,利益联结覆盖133户贫困户711人。通过产业带动,村民领到的劳务工资已经有10多万元。

记者在村里看到,边疆村人居环境也大为改观,不少村民的房前屋后已经硬化,室内室外整理得干净整洁。“我们完全有信心如期实现脱贫摘帽。”晏飞说,现在谁家住在哪、从哪走、什么生活状况,干部们都了如指掌,脑海里都装着一张图。

“累并坚持!”“不脱贫不撤退!”“再坚守最后几个月!”……工作中,扶贫队员们互相鼓励。“他们从年初进驻村里就很少出去过,当初来的时候个个白白胖胖,现在又黑又瘦。”时间久了,邓文远对每个扶贫队员都很熟悉,也很佩服。在村委会后面的大山间,“决战边疆 决胜小康”的标语牌迎风矗立。而在村脱贫攻坚指挥部,每天的扶贫工作日志依然在更新。

高原上绽放的光芒

来自青海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故事



▲一位牧民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光伏发电园区内放牧(2019年6月16日摄)。

新华全媒头条

新华社记者张旭东、陈凯、王大千、陈炜伟

青海,是民歌中“那遥远的地方”,受平均4000米以上高海拔等自然条件所限,这里也成为决战“三区三州”深度贫困的重要阵地。

脱贫攻坚进入收官阶段,新华社记者于2020年夏秋之交来到这片山穷水尽的土地,聆听浩荡江河、广袤牧场、搬迁新村的回响:一个个脱贫故事,在离天最近的高原大地上,定格成画,汇聚成光。

无际草原上的新村落

从省会西宁驱车向西南方向行驶5个小时,景色也从高楼林立的都市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高原草场。

临近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城,一派秀美气象让记者途中疲乏尽消:一个坐落在碧绿草原中的村落映入眼帘,一排排色彩鲜艳的藏民居错落有致,村中央建有一块标准足球场,正在踢球的孩子追逐嬉戏……天空格外透亮,人们笑声爽朗。

作为海南州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,这个名为“安多”的民俗文化村占地1500亩,安置有涉及48个村的853户、3421名农牧民群众。休闲广场、商业作坊、电商基地和乡村旅游富民设施等配套,让搬迁群众有了“从未享受过的好日子”。

“以前老村里,土房子黑乎乎,用煤油灯。如今在新房子里,用自来水再也不用发愁啦。”65岁的藏族阿妈周德打开话匣子就不停,一连串藏语让负责翻译的当地扶贫干部直呼“跟不上”。

周德过去住在黄河峡谷海拔3000多米的曲什安镇塔洞村,到县城要翻过好几座大山,说起当时艰难的日子,周德直摆手。

为改变“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”的窘境,在国家扶贫政策支持下,2017年兴海县投资2.1亿元打造了安多民俗文化村这个易地搬迁点。

2018年秋天,周德和贫困户村民们一起搬到安多村。“山上的草场都流转出去了,每年2000多元的租金。”周德掰着指头算收入,“女儿在村里当保洁员,外孙女上小学每天校车接送,我看病全报销,还有低

保等补贴,家里年收入有3万多元。”虽语言不通,通过翻译交流却很顺畅。当记者提到“建档立卡”“低保”等词汇时,特别熟悉这些汉语字眼的她,眼里放着光,总是在笑。

采访临近结束,她追出门来,询问记者:“免费医疗政策好,这一点你们记住了吗?”

兴海县扶贫开发局局长久先太说,放下牧鞭的村民们正在政府引导下,积极发展旅游等多元产业,这个新建的搬迁村两年来人均增收2.16万元。

黄河蜿蜒曲折,从兴海县向东300多公里,流经海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。两年多前,尖扎县依黄河地势建成了有251套住房的易地搬迁安置点——德吉村,全县7个乡镇30个村的251户、946名藏族群众走出大山,搬到这里。

德吉村的蓝天,一碧如洗,成排的房屋中央是文化广场,旁边高大的黄河水车缓缓转动。如今,德吉村实现了从易地搬迁村到“网红景点”的转变,游客络绎不绝。

记者走进卓玛太家的民宿,院落里有优雅的小木屋,屋内藏式土炕连接取暖的藏式铁炉,奶茶咕嘟冒着热气。

“就像阳光照进我的家。”卓玛太这样形容国家扶贫政策。以前一家7口年收入不足1万元,在当地扶贫干部帮助下,他使用“关门是家、开门是店”的民宿经营模式,今年暑期旺季每天进账超过3000元。

“青海上个月已刷新的‘绿电百日’纪录,河南、北京等地的‘绿电’,都有这个园区的贡献。”

位于海南州共和县的塔拉滩,昔日是沙丘遍布的荒漠戈壁,也曾是三江源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。

“为生活,要养牛羊种地;为生态,需禁牧退耕。两难中,风沙逼走住户,最多的搬家3次。”共和县恰卜恰镇西台村党支部书记马进学说。

如何破解生态、贫困的双重难题?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格尔木到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、贵德,从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再到海东市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……记者沿路处处都能听到当地利用光伏产业扶贫的故事。

抓住国家政策机遇,立足高海拔和日均日照时长达8小时等特殊地理气候条件,塔拉滩建成了光伏发电基地,其中容纳5县11个村采取“飞地”模式集中建设的50.5兆瓦村级光伏扶贫电站,探索出生态治理、新能源产业发展、贫困户增收有机结合的“生态扶贫”路径。

“一是设置与贫困户自身能力相适应的光伏公益岗位,实现家门口就业;二是大面积铺设光伏板遏制风速、涵养水土,改善局部生态。”海南州扶贫开发局局长王学军说。

有了光伏板遮挡,荒滩上的草慢慢长了起来。记者在现场看到,每排太阳能电池板的尽头,都竖有带着扶贫村名字的标牌;太阳能电池板下绿草繁茂,还特意留出1米多的高度,方便羊群穿行吃草。秋冬季节,除草消除火灾隐患也成了如今当地扶贫的工种。

光伏好效益带来扶贫好收益。塔拉滩园区设置脱贫户光伏公益岗位5664个,安排上岗1427人,发放工资174.23万元,为贫困群众带来好机遇。

新媳妇回家嫌穷,一个月就跑掉了西台村民马生建,潦倒半生,直到去年快50岁才又娶了媳妇。

“多亏了光伏分红,我还能去园区放羊,算下来每月能挣3000元。”在鲜花盛开、蔬菜满园的家中小院里,马生建边聊边顺手拔了几个萝卜递给我们。

因为光伏,成千上万个“马生建”“像重新活了一次”。

一路走来,一个感受越发明显:不论身处何处、环境如何艰苦,各地干部群众都能变废为宝,拿来喂牲畜。

且末县畜牧局数据显示,目前该县已建设19个养殖小区,约4500个低成本牛羊圈舍,累计节约资金超过4360万元,未来规划在全县共建设41个养殖小区,“羊圈是给羊住的,不是给人看的,盖得再精美也没意义,钱应该花在刀刃上。”且末县委书记徐凯说。

同样,在当地的枣农们看来,红枣是用来吃的,个头大小不是最重要的,关键是安全优质。

且末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脱贫攻坚重点县,艾萨2017年实现了脱贫摘帽,除了养羊,他还种了15亩红枣。从前年开始,艾萨跟很多枣农一样,不再

“有了更辽阔的远方”

9月,开学季。兴海县安多民俗文化村的曹化加,走进了青海民族大学,成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大一新生。3年前,他随长辈搬出贫瘠大山。如今的他,成了全家奔向更好生活的新希望。

9月,收获季。兴海县夏塘村的尤拉太转正了。去年从青海大学毕业后,尤拉太被纳入一家电力企业的就业扶贫人才专项招聘计划,成为一名水电站实习员工。他说:“转正后工资会涨,助学贷款很快就能还清了。”

如果说,易地搬迁是住上新房子,光伏产业是鼓了钱袋子,那么对教育的重视、观念的转变,则是贫困群众希望看到的,是脱贫攻坚中耀眼的光。

“脱贫攻坚”“15年免费教育”……记者在青海藏文搜索引擎“云藏”看到的这些排名前10位的热词,充分透露出高原群众用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期盼之情。

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,在国家政策扶持下,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倾力攻坚,全省42个贫困县,1622个贫困村全部脱贫退出,实际减贫53.9万人,高原大地发生巨变。

一场雨后的贵德县,丹山碧水蜿蜒相映,河谷林郁葱葱。

在贵德县常牧镇切扎村,村民万德卡讲起两年前的场景,笑得合不拢嘴:当时,他作为脱贫光荣户代表到县里领奖——一辆农用三轮车,还即兴演讲了5分钟,“告诉大家是怎么致富的”。

人口多,草山少,5年前,万德卡一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5年来,万德卡一家不仅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住上了新房,还用扶贫专项贷款投资羊羔生意,去年开始他又担任草管员,生活红火了起来。

“等、靠、要,是拔不了穷根的。有党的政策帮助,我们更要自己去洒汗水、加油干。”万德卡的大儿子已经在青海民族大学读大二了,他自己还准备再投资开一个牧家乐。

当好政策遇上好干劲,双手就能创造好日子。

这几天,青海阿妈罗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藏族小伙儿斗本加,正忙着给当地的文化旅游宣传片进行后期制作。

30岁的斗本加带着几个伙伴,创办文化传播公司,已经拍摄了多部纪录片。斗本加这样说:“我们就是用自己的镜头,记录家乡的巨变。”

镜头下最美的风景,莫过于“人”。

去年,22岁的空姐周毛才从福建厦门航空公司辞职,返回家乡海南州工作。

“读书工作6年后回来,家乡不仅建筑更高了,还有了越来越多的电商、外卖、网约车。家乡更美了,生活也更方便了。”记者面前的这个藏族女孩,装束时髦,腼腆之中透出这个年纪少有的自信。

说起沿海和家乡的异同,周毛才让有这样一个心愿:希望家乡有一天也能拥有机场,让更多的鸟儿飞到更远更辽阔的地方。

一旁的当地干部告诉我们,其实,离青海湖不远的海南州机场已在研究和规划中……

想设法利用好优势资源来致富。哪怕只有一束光,也要用来照亮群众的日子。

目前,青海累计争取光伏扶贫指标721.6兆瓦,每年发电预期收入5.7亿元,直接带动8.74万户贫困户增收。其中村级光伏扶贫指标471.6兆瓦,实现了全省1622个贫困村村均290千瓦全覆盖,村均年度收益达到30万元左右,收益期长达20年。

“有了更辽阔的远方”

9月,开学季。兴海县安多民俗文化村的曹化加,走进了青海民族大学,成为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大一新生。3年前,他随长辈搬出贫瘠大山。如今的他,成了全家奔向更好生活的新希望。

9月,收获季。兴海县夏塘村的尤拉太转正了。去年从青海大学毕业后,尤拉太被纳入一家电力企业的就业扶贫人才专项招聘计划,成为一名水电站实习员工。他说:“转正后工资会涨,助学贷款很快就能还清了。”

如果说,易地搬迁是住上新房子,光伏产业是鼓了钱袋子,那么对教育的重视、观念的转变,则是贫困群众希望看到的,是脱贫攻坚中耀眼的光。

“脱贫攻坚”“15年免费教育”……记者在青海藏文搜索引擎“云藏”看到的这些排名前10位的热词,充分透露出高原群众用奋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期盼之情。

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,在国家政策扶持下,青海各族干部群众倾力攻坚,全省42个贫困县,1622个贫困村全部脱贫退出,实际减贫53.9万人,高原大地发生巨变。

一场雨后的贵德县,丹山碧水蜿蜒相映,河谷林郁葱葱。

在贵德县常牧镇切扎村,村民万德卡讲起两年前的场景,笑得合不拢嘴:当时,他作为脱贫光荣户代表到县里领奖——一辆农用三轮车,还即兴演讲了5分钟,“告诉大家是怎么致富的”。

人口多,草山少,5年前,万德卡一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。5年来,万德卡一家不仅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住上了新房,还用扶贫专项贷款投资羊羔生意,去年开始他又担任草管员,生活红火了起来。

“等、靠、要,是拔不了穷根的。有党的政策帮助,我们更要自己去洒汗水、加油干。”万德卡的大儿子已经在青海民族大学读大二了,他自己还准备再投资开一个牧家乐。

当好政策遇上好干劲,双手就能创造好日子。

这几天,青海阿妈罗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藏族小伙儿斗本加,正忙着给当地的文化旅游宣传片进行后期制作。

30岁的斗本加带着几个伙伴,创办文化传播公司,已经拍摄了多部纪录片。斗本加这样说:“我们就是用自己的镜头,记录家乡的巨变。”

镜头下最美的风景,莫过于“人”。

去年,22岁的空姐周毛才从福建厦门航空公司辞职,返回家乡海南州工作。

“读书工作6年后回来,家乡不仅建筑更高了,还有了越来越多的电商、外卖、网约车。家乡更美了,生活也更方便了。”记者面前的这个藏族女孩,装束时髦,腼腆之中透出这个年纪少有的自信。

说起沿海和家乡的异同,周毛才让有这样一个心愿:希望家乡有一天也能拥有机场,让更多的鸟儿飞到更远更辽阔的地方。

一旁的当地干部告诉我们,其实,离青海湖不远的海南州机场已在研究和规划中……

新华社西宁9月19日电

“破”羊圈、“小”红枣:大漠边城的别样经济账

圈共用一面墙。

托拉克拉克勒克乡党委书记尤志恒介绍,这是且末县近年来推行的低成本标准化畜牧业养殖,鼓励当地牧民充分利用已有资源,“甚至连一颗钉子都争取废物再利用”,降低圈舍建设成本,将经济效益最大化。

尤志恒给记者算了一笔账:建设一个375平方米的圈舍,用彩钢瓦等材料搭建新式圈舍需要花费近14000元,而搭建低成本圈舍平均仅需约6000元,节省下来的钱可以买七八只生产母羊。

此外,当地还鼓励通过牧草集中托管的鸡、棚顶上还有鸡笼。养殖小区里的圈舍是四户相邻而建,呈田字形,相邻两个

都能变废为宝,拿来喂牲畜。

且末县畜牧局数据显示,目前该县已建设19个养殖小区,约4500个低成本牛羊圈舍,累计节约资金超过4360万元,未来规划在全县共建设41个养殖小区,“羊圈是给羊住的,不是给人看的,盖得再精美也没意义,钱应该花在刀刃上。”且末县委书记徐凯说。

同样,在当地的枣农们看来,红枣是用来吃的,个头大小不是最重要的,关键是安全优质。

且末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脱贫攻坚重点县,艾萨2017年实现了脱贫摘帽,除了养羊,他还种了15亩红枣。从前年开始,艾萨跟很多枣农一样,不再

施化肥,不再喷洒化学除虫药物,利用养羊生产的有机肥来种红枣,“种枣除了枣苗和浇水,基本没有种额外成本”。

据徐凯介绍,当地的红枣需要进行5年的有机生长转换期,通过严格的检测后才能认证为有机红枣,价格也能卖到普通红枣的两倍。当前且末进入有机认证程序的枣园超过5万亩,今年拿到有机认证证书的枣园将达到3.3万亩。

艾萨家中的枣树已经挂满了红枣,果实已经开始泛红,个头不是很大,但很饱满。“去年卖红枣赚了6000多元,等通过有机红枣认证了,日子就会更甜了。”艾萨说。

艾萨家中的枣树已经挂满了红枣,果实已经开始泛红,个头不是很大,但很饱满。“去年卖红枣赚了6000多元,等通过有机红枣认证了,日子就会更甜了。”艾萨说。

新华社乌鲁木齐电